

符号学开拓丛书(第一辑)



赵毅衡 主编

传媒符号学

——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

胡易容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媒符号学: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胡易容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 4
(符号学开拓丛书. 第1辑)
ISBN 978-7-81137-911-2

I. ①传… II. ①胡… III. ①传播媒介—符号学—研究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3647 号

书 名: 传媒符号学

作 者: 胡易容 著

责任编辑: 董 炎

策划编辑: 汤定军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印 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印装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E - mail: tangdingjun@suda.edu.cn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220 千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911-2

定 价: 42.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5225020

序 言

冯友兰先生曾说过,对前人理论的研究,十分重要的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照着讲”大抵是对“实然所是”的描述,而在前人基础上的探索前行则往往形成“应然为何”的追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门学科实然状况是一个阶段性成果,但它们都从属于对“应然”的终极价值追求。就传播学来看,更需在把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学科的发展方向作前瞻性的探索与追求。

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划分易形成一种学术的“刻板印象”。我们常常如数家珍般枚举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两大流派、三种典型范式。然而,既有的划分却往往无形中成为学科的成规和壁垒。本书的一个缘起即是从传播学理论实然的研究现状入手,唤起对应然的讨论。本书的主题“传媒符号学”则是有意从“技术学派”与“符号学派”这看似毫不相关的两种路径入手,发掘其内在勾连,以期说明从“媒介环境”分析到“传媒符号语境”研究是一种重要的视角转换:“媒介环境”诉诸技术工具,而“传媒符号语境”诉诸“表意形式”。这一转变展现了一种更细致的观察,研究媒介如何通过“尺度的改变影响了人类表意甚至文化”。媒介并未接触人——机械的媒介技术始终与人保持某种冰冷的距离。虽然媒介构成了人所存在的中介环境,但这个“中介环境”终究需要构成表意形式的“符号语境”来改变人的符号表意形式。此外,环境是一种外在的“硬件要素”,而“语境”是关系言说的情境——在意义研究的问题上,语境是关系更密切的环节。不过,与常规用法稍有出入的是,本书所用的“传媒”既指“传”的过程,也指作为载体的介质和传播机构。因此,本书的主题就是“符号学视野下的传播与媒体研究”。

最终,本书想作一个提醒,学术的划分本身自设了某种视角。



不同视角只有通过相互印证,不同方法只有通过相互借鉴补充,才能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本书书名《传媒符号学》是对学科趋势的一个基本判断。首先,今天的传播学和符号学都受到“传媒”的深刻影响。根据雷蒙·威廉斯的总结,communication 一词四百年来的词义发展就是一个与“传媒”不断联系的过程。^①某种程度上讲,传播学研究,就是有关“传媒”的传播与意义交流的研究。其次,文化研究,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富活力的学术思潮,已经成为传统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方向,而时代语境下的核心课题就是“传媒文化”。其三,学界习惯于将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约等于美国实证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将其称为传播学的“传统学派”,大有唯此正宗之意。传媒文化研究恰恰需要从方法论上自我突破。为了彰显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本书自名为《传媒符号学》以示区别。同时,这一名字也使我们更易于区分“交际学”、“交往学”(它们的英文都是 communication studies)。其四,本书用“传媒”而非学界惯用的“媒介”,是由于“传媒”是一个意义边界更宽、维度更丰富的词。媒介是物理形态的性质描述,是麦克卢汉及媒介环境学派所使用的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语境的转变,学术界对媒介问题探讨已经不再限于一个单纯的“介质形态范畴”,它已广泛涉及“媒体”机构、体制及传播模式方面。“传媒”是个适切于这一复杂对象的称谓。其五,本书的研究对象为传媒时代语境下各种由符号构成的“文本现象”,故名《传媒符号学》。

本书上篇是对麦克卢汉及其所代表的范式、流派的研究。这一流派有诸多不同称谓,如媒介技术学派、媒介权力学派、多伦多学派、媒介环境学派。无论何种称谓,他们都有一个绕不开的原点——麦克卢汉。上篇即以麦克卢汉为原点,第一章“围观麦克卢汉”梳理国内外的评价;第二章“麦克卢汉式批判”进入对麦克卢汉关键命题的解读;第三章“延伸麦克卢汉:从技术环境到符号语

^① 从17世纪始,随着工业化技术飞速发展,communication作为“工具性、技术性的承载与运输”的抽象名词应用于“公路、铁路、运河”以及后来的“通讯技术”。引自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73.

境”梳理了从“技术哲学”背景到“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潮发展,指出“媒介环境”命题自设了“符号语境”的观察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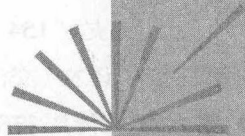
下篇通过展开传媒符号研究的基本框架以及研究现状,指出“传媒符号学”研究方式已经在我国传播学界广泛兴起,但国内学界对这种思潮尚未作出足够响亮的肯定。其原因是,一方面,传媒符号学研究集中于文本分析;另一方面,学界习惯于将符号学方法作为传媒的“批评理论”。因此,本书首要的任务是通过国内对国内的传媒符号学发展情况的梳理,为“传媒符号学”正名。

其中,第四章以传媒研究的符号学方法与经验主义方法的对比为切入点,指出两者的基本区别为“符号传播”与“信号传播”;第五章“传媒研究的符号学化”通过文献统计和典型研究分析,以佐证国内的传媒符号学研究不仅已经初具规模,且形成了多种研究方向与立场。最后两章是以传媒符号学为理论工具的个案研究。第六章主要是狭义的传播学研究,涉及新闻、广告、新传媒环境下的语义生成。第七章是广义传媒文化的符号学研究,广涉当代艺术、流行审美、图像叙述、视觉传达设计等内容。

本书并非凭空创生出一个“传媒符号学”,而是对它的一种再发现。作为一种“学”,这是对它未来发展方向的理解和判断,也是一种自勉和期许。

胡易容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目 录

Contents

● 引论:传媒研究的理论路径

第一节 学术研究的类 / 001

第二节 传播学流派的二分法 / 006

第三节 传播学理论范式三分法 / 013

第四节 从“元理论”看传播学的流派与
理论范式 / 022

上篇 麦克卢汉与媒介环境学派

● 第一章 围观麦克卢汉

第一节 麦克卢汉研究的起落 / 028

第二节 国内的麦克卢汉研究 / 035

● 第二章 麦克卢汉式批判

第一节 “媒介讯息论”的文化危机意识 / 044

第二节 “媒介冷、热论”的社会心理基础 / 055

第三节 “媒介文明论”的民主忧思 / 067

● 第三章 延伸麦克卢汉:从技术环境到符号语境

第一节 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技术哲学渊源 / 084

第二节 麦克卢汉的师友——英尼斯 / 093

第三节 媒介环境学派及其符号学命题 / 100

下篇 传媒符号学初探

● 第四章 传媒符号学的起点

第一节 从“信号传递”到“符号传播” / 109

第二节 从“物态媒介”到“社会性传媒” / 122

第三节 从内容分析到文本研究 / 127

第四节 从信息指令到元传播 / 134

● 第五章 传媒研究的符号学化

第一节 文献观察:中国大陆传媒符号学的兴
起 / 140

第二节 “交流学”:北美传播符号学的独特分

支 / 154

第三节 译文《交流学百年进路》 / 165

● 第六章 传媒符号学应用研究(一):新闻、广告、网络传播

第一节 全媒体背景下的广告创意突围策略 / 176

第二节 品牌势能与符号资源战 / 183

第三节 以符号分节理论为“新新闻主义”正名 / 188

第四节 在全文本法则中建构新闻经典 / 196

第五节 新传媒语境下的语义涌现——以“山寨”为例 / 206

● 第七章 传媒符号学应用研究(二):艺术与当代视觉文化

第一节 当代艺术的“元”解读 / 216

第二节 流行文化研究:“变态美”的流行与符号标出动力 / 225

第三节 视觉设计艺术(一):招贴赏析与符号文本的层次 / 238

第四节 视觉设计艺术(二):招贴的“符号温度”与受众卷入 / 243

参考文献 / 249

后记 / 256

引论：传媒研究的理论路径

第一节 学术研究的类

一、分类与符号学的“分节问题”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是之是”为理论之普遍性本体,开启了学科分类,但“分类学”并不被完全接纳为一种“科学”。这是由于,人们认为分类学(taxonomy)并不直接提供经验世界的解释。实际上,它包含了解释世界的角度。例如,我们总是力图用边界清晰的概念认知世界,但这种清晰实际上有某种误导作用。它令我们往往忽略了被概念片段建构的世界实际上延绵不绝而从未断裂。世界本来是混沌的整体,只有通过分类才能达成对世界的有效认知。分类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总是预设分类的角度。在分类之后,人们往往以之为世界的真相而放弃对其他关照维度的探索。

在符号学中,将对事物指称的分类称为“分节”。分节是多重的,分节的多重性指示着世界的多维度性。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依赖概念,而概念只是人们根据自身有限认知的归纳,是具体生活需要的反映。“分节”反映出分节实施者对事物不同侧面的注重,它甚至能反映文明的程度和方式。例如在不同国家,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分类就不同:中国长期以来实施城乡二元户籍制,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美国执行“出生死亡登记大纲”制,只进行公民出生、死亡登记,平时公民可以自由迁移、移民;法国则执行详尽的社会信息登记制,不仅登记公民出生年月、性别、单双胞胎等内容,而且还登记其父母

的职业、经济收入、国籍、宗教信仰等相关内容；日本实行的是户随人走的“住民票”制，以家庭为单位标明每个人的身份、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等，一旦成人，完全自由。同样作为现代社会的国家公民，中国公民身份最重要的分节是“城里人”与“农村人”（当然，这种分节正在变化）。其背后的逻辑是，中国城乡问题是该国面临的大问题，因此反映于社会文化。

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分节的变化往往带来理论的颠覆。因为，不同分节方式意味着不同参照坐标，新的坐标往往重构整个世界。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以演化之维、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以力比多之维、卡西尔（Ernst Cassirer）则以符号之维重构了那类我们原以为只是“两脚无毛直立行走”的动物。任何一种理论范式，都给我们提供一种独特的关照世界的维度。每一维度，都是对一度被遮蔽的知识的敞开与创造。这种敞开是人类主体性与存在价值的自我确证，也是人文科学的终极目标。不过，每一次新的敞开，也必然同时意味着另一种遮蔽。因此，范式的探索必然是历时性而无终点的旅程。

工业文明的现代化以来，人类分工高度发展驱动了学科专业高度细分，这种分节令学者们更易于成为“专科医生”而难以处理“全科”问题。事实上，学科间充满了渗透与相互跨界的张力。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用几何规律研究伦理学、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用生物有机体来看待社会，日前兴起并广受争议的“迷米学”（meme）也无非是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追随者们将他“自私的生物基因”借用到了对文化和社会的解读上。

二、理论、范式与学派

“理论”是人们在某一活动领域中联系实际推演出来的概念或原理，或是假设的一系列事实、原理。它是通过对事实的推测、演绎、抽象或综合而得出的评价、看法、或程式。根据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考证，理论（theory）一词的意指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其最早的英文形式是 *theoriques*（14 世纪），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希腊词源 *thea*。到 17 世纪其意涵已相当广泛，包括：（1）景象

(a theory or sight); (2)冥想中所浮现的景象(contemplated sight); (3)(思想的)体系;(4)用以解释的体系。第四种意涵在18世纪得到了较大发展,并使理论与实践(practice)产生了更重大的区别。而第三种意涵仍然被使用并使理论的概念具有“信念”的意涵,在人文科学领域中,“信念”是支持一种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在力量。这也导致学界经常将“理论范式”与“学派”混用。^①

一般而言,理论是一种客观规划,是人们经由实践概括出来的知识系统结论。因此,理论具有系统性,并需要一定的假设与方法。当我们说某一种理论的时候,强调的是该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区别。一是有效范畴的区别,如经典物理学不解决微观层面及宇观层面的问题;二是范式的区别,范式是某个具体的理论系统。

“范式”对应英文词paradigm来源于希腊文。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于20世纪70年代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使用了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在他看来,范式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集合。或者说,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科学领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立场。不同的范式规定各自领域内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以及解释答案所遵循的规则。它能够将存在于科学中的不同范例、理论、方法和工具加以归纳、定义并相互联系起来。作为科学范畴的范式不是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个别命题的集合,而是由许多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命题和原理组成的系统整体——库恩将这一系统整体称为范式。^②

“学派”与理论范式有所不同,理论范式指向应然的逻辑归纳,而学派的意义则包含了历史因素和偶然性。学派的形成史源远流长,派别形形色色、数不胜数。陈吉生对学派一词的源流与本意作了很好的总结,他指出,现代英文scholastic(现代含义包括经院哲学家、学究、学生)由希腊文skhole(讲学场所、学校)→希腊文skholazeine(学习)→希腊文skholastikos(好学的、博学的)→拉丁

① 雷蒙德·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刘建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488.

② 陈世清. 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3.

文 scholasticus(好学的、博学的)演变而来。古希腊最负盛名的柏拉图学园(由此形成了柏拉图学派,又称“学园派”)、路凯恩学校(公元前335—323年,雅典城外亚里士多德任教的学校)、莱森学园(亚里士多德派讲学的学园)等中的“学园”,大多用拉丁文 lyceum(学园、讲学场所、学术讲演场所)表示,它在当时实与拉丁文的 schola(讲学场所)的含义大同小异。中文“学派”可以上溯至先秦,“百家争鸣”就描述了一个学派主张繁荣而自由的时代。在中国古代,学派特别讲究师承关系。《辞海》将“学派”词条解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因师承传授使得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而可以形成“师承性学派”。因以某一地域、某一国家、某一民族或某一文明、某一社会、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群体,同样可称为“学派”,或曰“地域性学派”(包括院校性学派),或曰“问题性学派”。^①

由上,学派的形成大致可归于三种因缘:师承、地域、问题。相应地,学派也可以此标准分为三类:“师承性学派”、“地域性学派”和“问题性学派”。许多学派往往兼具这三种因缘。

综上,“理论”是一个泛指的概念,而“理论范式”特指具有共同理论要素或信仰的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身份的“范式”必须被进一步界定。范式作为一种学科理论所遵循的信条是,它必须具有内在逻辑自洽性。在同一范式内部,理论应当具有普遍有效性。“学派”是对于师承、地域、问题等非学理性问题的描述。哈维认为一个学派必须具有四个条件:(1)一个提供思想领导的中心人物;(2)一个学术的和地理的位置;(3)财政支持;(4)传播其工作的手段。^②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例:

首先,就思想领导者来看,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领袖彼此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并具备共同的学术信念。他们受到共同的以哲学为主的学术训练,共同以左派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霍克海

① 陈吉生. 试论中国民族学的八桂学派. 广西社会科学, 2008(7): 17.

② 罗杰斯. 传播学史: 一种传记式的写法. 殷晓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141.

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er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不仅各自具有大师级的学术影响力,彼此间也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其“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无论是在早期代表人物那里,还是在被称为第三代学术领袖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那里,都一以贯之。哈贝马斯在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其次,就学术位置而言,法兰克福学派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许多杰出的成员均有自己独特的成就与影响力。例如,马尔库塞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青年学生运动中被奉为新左派的思想导师、精神领袖。人们甚至将他同马克思、毛泽东并称为“三M”。法兰克福学派虽然形成于二战之前,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才由于马尔库塞的作用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马尔库塞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中最著名的领袖人物。

第三,再看法兰克福学派的财政支持情况。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在学术思想上享有自由,在经济上也具有独立性。谷物经营企业大亨H. 韦尔提供了慷慨的资助。由此,批判理论家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行事的空間,以非凡的视野,对既有力量进行质疑与反思。学派成员流亡美国后,这笔资金也得以转移至美国,但显然不如从前那样宽裕。在美国期间,批判学派曾与拉扎斯菲尔德等一批经验主义学者进行合作,以便获得商业性资助。

第四,传播工作的手段。这一点很难有统一的标准。但从效果来看,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无疑是成功的。

由此,在传播学的各种分类中,学派的界定是一种公众性认知,而范式则是一种理论的系统性界说。不同学派、不同范式的传播理论讨论的对象是具有共同属性的,即可以广义地归为某个具体类型的传播行为,但这些方法与流派的方法与立场则千差万别。

第二节 传播学流派的二分法

传播学流派二分法,指以欧洲为中心的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派。拉扎斯菲尔德(Paul Felix Lazarsfeld)最早意识到两种学派的分歧。1941年,拉扎斯菲尔德组织编辑了一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学刊《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收集发表了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他本人也在上面发表了《关于行政管理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Remark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区分了两种学派,并将其分别命名为“行政管理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和“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行政管理研究”,指以拉扎斯菲尔德及其美国同行为代表的“为服务公共或私人的经营管理机构而进行的那种类型的研究”,是一种为解决经济或社会问题而进行的研究。这种方式的研究后来被称为传播学的“传统学派”或“经验主义传播学派”。拉扎斯菲尔德认为,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批判研究”是为了研究现代社会的一般趋势以及人的基本价值。^①

到20世纪70年代,两个阵营在传播学内部开始正式对峙。1977年英国学者J.柯瑞(J. Curran)的著作《大众传播与社会》(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拉开了这一序幕。1985年,夏威夷召开的国际传播年会以“典范对话”为主题,首次形成两大学派共同探讨的局面。此后,学界从研究方法、立场等多个因素比较了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传统与欧洲批判学派的传统。^②国内学者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观点。

一、经验学派及其芝加哥师承

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派,指以实证经验性方法来考察传播现象的社会科学流派。在传播学中特指以美国学者尤其是芝加哥学

① 王勇.“双峰并峙”还是“三足鼎立”:传播研究学派刍议.新闻界,2007(4):19.

② 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2):40-47.

派发展而来的传播学研究思潮。它既是方法论的概念，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美国实证经验方法为代表的传播学研究流派，又被称为传播学的“传统学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传播学学科的建立是由实证经验主义传统开启的。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作为这个学科理论的第一位集大成者，打通了学科建设的道路，开设了第一个新闻传播学博士课程。罗杰斯(E. M. Rogers)对北美经验主义传播学历史渊源作了清晰的勾勒。他将传播学思想先驱的崇高荣誉给予了三三位欧洲思想家：查尔斯·达尔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并将传播学的兴起看做是芝加哥学派的直接影响结果。他对芝加哥学派对建立传播学的贡献作了如下总结：

它使符号互动论概念化了，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将传播置于人性如何形成和变化的中心的理论视点。

它认为大众传播是美国民主社会面临城市社会问题而生存下去的一个可能的手段。

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进行了关于电影对儿童的影响的佩恩基金研究，这些研究为许多后来的传播效果研究提供了一种早期的模式。

它使像J. 亚当斯以及她的与赫尔堂相联系的社会学同事那样的女性学者转入作为一个独立与应用的领域的社会工作。

它的方法论途径导致被称为解释学派的一批当代传播学学者的出现。

——E. M. 罗杰斯^①

近年来，芝加哥学派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关系得到了学界更多重视。罗杰斯认为，杜威(John Dewey)、库利(C. H. Cooley)、帕克(R. E. Parker)、米德(G. H. Mead)是美国传播研究的源泉，而帕克

^① 罗杰斯.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殷晓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73.

是美国“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由于受到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的方式》等著作的影响，国内学者对芝加哥学派与传播学的关系有较多研究。如果说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的方式》中只是通过人物传记的方式“浅出而不深入”（李金铨语）地从发生学角度谈论了芝加哥学派与传播学建立的关系，那么黄旦先生则从学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角度分析了芝加哥学派与传播学早期思想的脉络承继关系，他在《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中总结了两者的六点关联：

1. 传播及其大众媒介不再是芝加哥学派所以为的人类关系的本质，而是成为了工具和技巧；

2. 芝加哥学派和李普曼讨论的是社会改革批判，中心是“公共领域”的问题，不过在后者眼里，这已是徒有躯壳。到了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则只是政治和商业影响的有效性，媒介的接触者不是公民，更多的是劝服对象和消费者；

3. 芝加哥学派所没有涉及，在李普曼那儿没有展开的“传播效果”，成为研究的中心；

4. 双向互动——芝加哥学派眼里建构、维系人类关系的机制，在李普曼处受到经济地位等条件的严格限制，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已荡然无存；

5. 在芝加哥学派看来，传播是社会文化保存和发扬光大的渠道，李普曼则以为是虚拟环境的来源，而大众传播研究确立时，传播媒介就是劝服工具；

6. 芝加哥学派所开创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到了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完全成为实证主义，米尔斯（1959/2001）称为抽象经验主义，从自然科学借鉴而来，并做了权宜性修改。表面上看与价值无涉，实际上避开结构问题，以心理主义偏向来研究情境问题。^①

^① 黄旦. 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27.

二、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地缘关系

由于批判学派并不像北美经验传播学派那样边界明晰,因此,要认识批判学派,首先要明确如下问题:什么是批判学派?是否有一个清晰而固定的学者群?我们经常说的“欧洲批判学派”和“北美经验学派”是否是地理上的实指?

首先,批判学派不是一个主动的自我称谓,而是一种被赋予的立场。学界常常认为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是水火不容的两个阵营。但实际上,“学派”是一个松散的概念,如果按照哈维的四个条件来看,批判学派无法被称为学派,而更适合被称为一种共同持有的立场,或一种约定俗成的惯用。批判是对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经验学派的一个必要的反拨。学者陈力丹认为,传播学批判学派是相对于美国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言的,没有特别的衡量标准,只是依据研究方法、内容、指导思想的差异的大致的划分。因此,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划分并非绝对严格意义上的区分。本书认为,批判学派概念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1)最广义的批判学派是指所有持有批判理论立场的学者,这些学者难以用任何其他的方式进行归类。如:爱因斯坦学派是对牛顿经典物理学的颠覆与批判。这种广义上的称谓并不具有具体学术意义。(2)第二个层次是指在传播学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起点的社会批判思潮研究范式。它包括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分析学派),也包括美国本土或其他地区对媒介权利等问题进行批判的流派。(3)第三个层次,是狭义的批判学派,等同于法兰克福学派。

具体来看,批判学派具有以下特征:批判学派是一种立场,而非一种方法论指向;批判学派注重意义的研究,其采用的方法论往往具有某种思辨色彩。学界常常将符号学视为批判学派的其中一种。本书的观点是:符号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可以指向批判,也可以指向经验性操作。赵毅衡先生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将符号学称为“人文科学的公分母”。既然是公分母,就不必是“批判的分母”。就目前趋势来看,符号学也呈现出强大的建构色彩:如法律符号学并不提供对法律本身的反思,而是提供对法律文本的

有效解析;再如,设计符号学就是为了提供更有效的设计指导。

从地缘关系看,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也常常被称为“北美经验学派”和“欧洲批判学派”。从学术地图的地理分布来看,称批判学派为“欧洲批判学派”原因如下:

首先,具有批判和反思精神的欧洲思想家是批判学派的先导和起源。这些最重要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来自欧洲,除前文提到的传播学三大欧洲先驱,批判学派最具影响力的地方仍是欧洲。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之后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广泛影响,甚至在美国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并得以传承,但它并非法兰克福学派的直接影响结果,并且在美国批判的声音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方式有一些方法上的差异。而在欧洲本土,以英国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思潮是法兰克福学派之后最有影响力的“批判阵营”。

其次,称为“欧洲批判学派”也是由于北美批判思潮相对弱势的地位。在美国批判学术思潮中,不乏杰出的理论家。比如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总体而言,美国的批判研究总体思路具有某种社会现实批判与实用主义色彩。美国的批判理论研究具有某种狭义的传播概念的特质。美国传播批判理论家汉诺·哈特(Hanno Hardt)认为,美国传播批判研究的关怀处于“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他对美国批判传播理论的特点作了这样的归纳:

它和人们如何通过交往在一起生活(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研究若即若离,与具体的思想活动或艺术活动(高雅文化的终结与通俗文化的兴起)的关系也不太密切,但与个人受到的真实或潜在影响的关系就比较密切,与操作或改造社会的力量的研究关系也比较密切。美国社会科学的文化关怀对行为的变化作了狭义的解释,这样的解释被置于实验探索的非历史语境中,反映了行政学派的传播研究的优先考虑。实际上,行为研究兴趣的特点是简化文化观念,这是传播研究专著效果分析的反映。吉尔兹曾经说过:“美国社会科学里文